移民岁月 第十一期
YI MIN SUI YUE

移民垦荒新乐章（一）

刘天明

屯田垦荒是典型的集体移民开发活动。历史上的屯田垦荒大都以跨省集体移民开发为主体。其中还有军屯和民屯之分。其对开垦荒漠、发展农业、固疆守边、解决粮食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宁夏当代屯垦，总体上看，也具有典型的集体移民开发活动的特征，但许多情况又不同于历史上屯垦。一是宁夏屯垦始于军事部队开荒屯垦活动，最后部队整体转业，成为非军事色彩的农垦经济开发活动，具有集体移民的性质。二是开荒屯垦、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一度吸收了大批罪犯建立了劳改农场，也成为宁夏当代移民屯垦的一部分。四是吸收了许多外省和宁夏本地的农民进入到农垦大军之中，吸收的过程呈现分散的、逐渐的特点，这与集体性的集中移民开发有所不同。五是在跨越的宁夏本地农民中大部分是跨区域迁移到农垦系统的，是具有移民性质的。但也有部分是吸收的当地农民，不具有移民性质。但从总体上看，宁夏当代屯垦仍然属于集体性的移民开

发活动。宁夏当代屯垦移民开发活动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1950年至1958年

1950年12月1日，由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垦荒先遣队在灵武县创建了西北地区第一个国营农场——灵武机械化农场，高宜之任场长。翌年4月，改为国营灵武农场。与此同时，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除一团担任宁夏南部剿匪任务外，其余在中卫县城北的新滩和龙宫滩积极耕地开荒、修挖水渠，开展大生运动。此为宁夏当代屯垦移民的开始。1955年5月，农建一师调来一个连约130人建立了暖泉农场，并开始生产；1955年10月24日，甘肃省贯彻国家农业部6月24日通知，农建一师正式转业，取消军队建制和番号，国营前进机械农场的3个分场改为国营前进第一农场、国营前进第二农场、国营前进第三农场。此前，农建一师还抽调部分人员，先后建成连湖、平吉堡、暖泉等国营农场。至自治区成立前，已建立军队所属的国营农场11个。到1958年底，宁夏农垦所属的灵武，前进第一、二、三农场，巴浪湖，连湖，暖泉等7个农场共有职工3454人，总人口6812人，开

垦荒地15.37万亩，固定资产总值869.7万元。1958年的工农业总产值368.24万元，生产粮食1050.12万公斤，平均亩产108.3公斤。宁夏农垦系统农场的框架基本形成。随后，不断地从军转人员、知识青年、随迁家属、招聘农民、外省移民等渠道扩充人员，形成庞大的农垦移民队伍。

1958年至1965年

此阶段移民屯垦开发呈现出四个较大的起伏和变化。一是移民屯垦规模和队伍得到扩大。在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下，自治区政府决定新办8个农场。农垦局1959年7月开始勘测土地，从各农场抽调干部及从北大荒求宁的军官，组成建场筹备组。自治区政府1959年12月24日批准建立的平吉堡农场（银川市）、渠口堡农场（中宁县）、兴仁堡农场（海原县）和王家团庄农场（同心县）。后又于1960年3月批准建立李家大湾农场（盐池县）、白土岗农场（灵武县）、二道湾农场（吴忠县）和镇北堡农场。8个农场规划耕地面积70多万亩。这些地区地势平坦、荒地面积大、土地连片集中、土质较好，但多数农场近期内无力解决灌

溉水源。所以，这8个农场中除渠口堡农场和平吉堡农场在跃进渠和西干渠开通后水源有保证，能进行正常生产外，其余6个农场因不具备灌溉条件，均于1961年11月撤销。尽管如此，两个新建农场使农垦规模得到了扩大。

二是大批浙江青年加入农垦队伍。1959年宁夏和浙江省商定5年内由浙江省动员30万青年支援宁夏建设。1959年5月开始移民，至1959年底共5万余浙江青年到达宁夏。这批支宁人员有3.1万多人被安置到银川等11个市县328个安置点，有7000多人安置到10个国营农林场，有1.1万多人安置到工矿、财贸、文教、卫生、青铜峡电站工地和国家机关。据《宁夏农垦志》记载，仅1959年5月，灵武、连湖、巴浪湖、前进、暖泉5个农场安置第一批浙江支宁青年5821人。1960年5月至6月，上述5个农场和平吉堡、渠口堡2个农场又安置第二批浙江支宁人员21079人。安置人数最多的前进农场，1960年末职工人数为2623人，比1958年的1087人增加了2.4倍；暖泉农场1960年末职工人数为2430人，比1958年的196人增加了12.4倍。（未完待续）

宁夏富硒枸杞第一人（二）

——访浙江支宁青年南梁农场场长徐阿奎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徐阿奎：那个时候毛主席说过一句话，叫做“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就抱着这种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心情报的名。浙江省支援宁夏也是很真诚的，报名是有条件的。就是要选表现优秀的青年、身体好的、没有家庭拖累的，而且还专门提出党团员要带头报名，被批准来宁夏是件很光荣的事，打起背包就出发。在离开老家时，萧山县政府还给我们开了个欢送誓师大会，我作为代表发言。发言中我就表示了三点：第一，我们到宁夏去一定要把宁夏建设好；第二，坚决不当逃兵，不给浙江人丢脸；第三，我们在报纸上见，意思是要做出成绩上报纸，向家乡人民报喜。

到宁夏时乘坐的是闷罐专列，一节车箱有一百多人，睡在车箱的地板上，连个座椅都没有，稻草铺在车箱里，大家挤座在一起，累了找个缝隙躺下睡会。车上没有厕所，每个车箱里配了两三个马桶，

男的还好些，背过身子用就行了，女青年就比较麻烦，在那种情况下大家也没法讲究，女同志用马桶时几个人围成人墙。每到车站时有人下来溜马桶，走走停停，7天7夜后到了银川。当时浙江支宁的都是年青人，身强力壮，光萧山就来了几百人，有几个带着家属，有一两个小孩。我算个带队的，路途上太累了，休息不好，吃不上饭，难免有人发点牢骚，我在车上还要做工作，安慰大家。

到银川后开始分配，征求了一下我的意见，问我希望到什么地方去，我当时对宁夏是一点也不了解，也不知道哪里好，但我们南方人爱吃大米，我就给管分配的人讲，哪里有大米饭吃就把我分到哪里，管分配的人笑了笑，你这个条件可以满足，就这样，把我们一起来的126人编了一个连，分到芦花台原林试验场，让我当连长。后来我又被提成芦花台原林试验站副站长。1966年变成生产建设兵

团，成了军垦，任命我为生产股股长，可任命的权力一天没用，文革来了，又被免职，变成了走资派，批斗了一年多。

徐阿奎从报名支宁的那日起，就怀着建设美丽新宁夏的决心，满怀希望，但理想与现实总有距离，难以合拍。到宁夏后先是低标准，后是起起落落的运动折腾，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好在离家时父亲告诫他：“不管到哪里，都要老老实实做人，公家的便宜绝不能沾，欺骗组织上的事绝不能干。”也就是这两个绝不能的教诲，让徐阿奎基本上躲过了所有疾风暴雨般的运动冲击，独善其身，在文革中还获得了对立的双方的共同信任。

徐阿奎：刚到宁夏时印象最深的是低标准，也是最困难的时期，粮食供应标准每人每月21斤，根本不够吃，我就带着200多人到贺兰山抓榆树叶，回来后打成浆，和玉米面和在一起，做成糕，每人

一切一块，再喝碗糊糊。收获最大的一次是遇到一群黄羊，被我们围住了，但跑不过黄羊，追羊时有一只羊掉到了山下被抓住，大家会了一次餐，吃得特别香，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的宁夏比浙江落后很多，如果没有当年各地的支援，就不会有后来的大发展。南方人种水稻全是插秧，到宁夏后看到全都是撒播，观察了一年后，我们确定，撒播肯定不如插秧，于是我们就建议，推广水稻插秧，开始领导还怕失败了承担责任，但我们都这样建议，最后同意先试验几亩地，我向领导保证：“插秧的产量一定会高出撒播的产量。”只用了一年时间，试验的结果就出来了，插秧的水稻产量一下子要高出撒播的20%以上，当时撒播的收获300多斤不到400斤，推广插秧后产量都在500斤以上，以后插秧技术全面推广，增产作用特别明显。（未完待续）
（简重生 马君武 整理）

总工程师的人生经历（四）

——记长城机床铸造厂蔡文礼老人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据蔡老回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来宁夏考察企业发展情况，当时自治区政府将此次考察安排在长城机械铸造厂，安排考察时长30分钟。蔡老说：“邹家华就是搞工程的，他原来是沈阳哪个厂的总工程师，后来到我们研究所当所长，最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对这套东西非常清楚。这里安排了30分钟，实际在我们这里待了两个小时。”最后政府那人找我说：“老蔡，怎么搞的，不是说好的30分钟吗？”我说你问总理去，他不走我还能赶他走呀。最后他就问一个问题：“你们铸造厂在宁夏有什么优势，是怎么干起来的？”孙总说：“宁夏没啥优势，除了电比较便宜，原材料都是全国的，在宁夏没有原材料。宁夏原材料我们用不了，不能用，所以我们能干起来就是一种生存的紧迫感，不干我们这些职工咋办？也就是说为了生存去开发市场，去引进技术，去提高管理水平。”现在的共享集团在宁夏来看挺好，在全国铸造行业来说也是数得着的，彭凡他们提出一个温水煮青蛙的效应，青蛙不跳出来说了，跳出来说了，他向职工灌输这种思想，就是现在的企业文化。“至于我们这一代人，看到企业发展很高兴，我们为这个厂做的一点贡献，算是无怨无悔吧。”蔡老说，“我很佩服孙文靖厂长带领企业发展，当

然我也很赞赏任总经理彭凡。那个孙总，什么招都能想出来，我们怎么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最后改制，员工都有股份了，虽然有股份的员工现在都退休了，这也是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机制上怎么探讨这个问题。那时候我们给连续三年评上劳模的职工奖励一套房子，那房子有90多平方米，我们奖励几十套房子出去，激发鼓励大家的积极性。后来他们说你们真敢干，反蔡，怎么搞的，不是说好的30分钟吗？我说你问总理去，他不走我还能赶他走呀。最后他就问一个问题：“你们铸造厂在宁夏有什么优势，是怎么干起来的？”孙总说：“宁夏没啥优势，除了电比较便宜，原材料都是全国的，在宁夏没有原材料。宁夏原材料我们用不了，不能用，所以我们能干起来就是一种生存的紧迫感，不干我们这些职工咋办？也就是说为了生存去开发市场，去引进技术，去提高管理水平。”现在的共享集团在宁夏来看挺好，在全国铸造行业来说也是数得着的，彭凡他们提出一个温水煮青蛙的效应，青蛙不跳出来说了，跳出来说了，他向职工灌输这种思想，就是现在的企业文化。“至于我们这一代人，看到企业发展很高兴，我们为这个厂做的一点贡献，算是无怨无悔吧。”蔡老说，“我很佩服孙文靖厂长带领企业发展，当

书去，课程都安排好了。孙总不放手，说：“你可以不干，可以白拿工资也不放。”宁夏工学院也没去成。1984年，厂里调整班子的时候，要蔡老当总工程师，蔡老坚决不干。组织部的人说：“那么多单位，还遇到第一个不想当官的人。”直到1985年，没有了退路才当。

蔡老的夫人张问秋做工艺。她说：“铸造厂相对比较累，日本件来的总是那么急，加班加点的干，我得回家做饭，还得管孩子。孩子都睡觉了，我还在家做工艺。他呢，家里基本上不怎么管，早上7点钟就进厂了，看看生产前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我睡醒一觉，他还没回来，等人家浇筑完了，平平安安的没事了他才回来。他早晨走时，孩子们还没醒。家里的事情都由我一人管。”蔡老说：“我48小时没回家的时候，就为了一个铸件，我不能离开现场。”张问秋说：“他没回家，我赶紧往车间跑，还以为出啥事了。一进车间他还在那干嘛呢。”蔡老说：“这个铸件特殊，在北京铸件展销会上，搞了一个行业评比，我们获得全国第一名。当时人家不服气呀，什么上海的、北京的、沈阳的都参加。当时主管这个评审的专家说，你们干的都是两个导轨，人家八个导轨。颁奖的时候，上海松江铸造厂的蓝厂长在旁边，表示服气。”

红军西征 点燃了抗战大后方的熊熊烈火

王晓仙

日本入侵中国，宁夏没有沦陷，同心不是抗战前线，但是抗日救国的热情却一直高涨，这都缘于红军西征。

1936年6月，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出陕北，西征进入宁夏同心县，西征总指挥部就设在同心县豫旺堡，红军西征打的旗号就是“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旗帜。按照中央的部署，西征红军除了扩大和巩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迎接二、四方面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任任务外，还有个战略任务就是伺机夺取宁夏，打通共产国际通道，寻求北上直接对日作战。

但是，当时的民国政府，置大片国土沦陷敌手于不顾，漠视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仍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组织了260个团50万的兵力妄图在甘宁一带集中消灭红军。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宁夏战役”，三军撤入陕北，再寻求入晋开赴抗日前线。

红军西征，虽然没能夺取宁夏北上直接对日作战，但抗战烽火却在同心乃至宁夏中南部熊熊点燃。在下马关成立的陕甘宁省豫旺县苏维埃政府和在同心城成立的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两个红色政权中，都成立了“妇女抗日救国会”“回民抗日救国会”“江湖抗日游击队”等群众组织，红军“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深入民心。在下马关红城水的娘娘庙内，至今还保存着当年红军的真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日本、救中国”的呼声穿越时空，永久回荡。

到西征前线访问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这里找到了力主抗战的中国军队，看到了挽救危亡的中国希望，看到红星必将照耀中国。他想要在陕甘宁边区看到的一切，特别是红军坚持抗战的主张，用一张最直观的照片介绍给全世界，用什么呢？进军的冲锋号！对，拍一张吹响“抗战之声”的红军小号手。在豫旺堡，他连着追拍了两个早上司号员晨练的照片，但都不太理想，正在苦恼，恰逢刚率部打了一个胜仗，上级奖励了一身新军装的营党支部书记刘全。英武挺拔、英姿勃发的19岁的谢全让斯诺眼前一亮，他主即请过来塞给一把军号，又把印有“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的军旗插到旁边，拍下了那张世界经典图片“抗战之声”，并印在自己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的封面上广泛流传。让国际社会第一次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抗战的决心。

和斯诺同来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被红军和边区人民的抗战热情深深感动，决定留下来参加中国抗战，并根据豫旺地区多数民众都姓马的特点给自己改了中国姓名马海德，表明

贺兰石砚

阎子江

解放前，我自幼随父学贺兰石砚雕刻艺术。解放后，仍从事这门手艺，所以，对贺兰石砚的历史也知道一些。

宁夏贺兰石砚，因其石料产于贺兰山而得名。贺兰山在银川西三十公里处，群峰迭翠，南北绵延数百里。贺兰石产于贺兰山小口子，又名小滚钟口，分前山石、后山石两种。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撰写的《宁夏府志》卷三，有这样的记载：“笔架山，在贺兰山小滚钟口，三峰矗立，宛如笔架，下出紫石可为砚，俗呼贺兰端”，此处是记载前山石。后来，清末湖南人谢威风当宁夏府台时，他擅长书画，喜贺兰石砚，便令人开采后山石。后山石产于大寺沟转角楼的山峰背面，石质比前山石细润，彩色石也较多，所以人们一般用后山石制砚。

据地质部门测定，贺兰石在距今约十三亿年前就形成，属水成岩。它质地均匀细密，清雅莹润，绿紫两色，天然交错，刚柔相宜，叩之有声，是一种很好的工艺原料。用它制作的砚台，图案清新，色彩对比强烈，呵之可出水，具有发墨快，发墨细，不干不臭，不拔笔毫等特点。1963年，董必武同志视察宁夏时题诗赞誉曰：“色如端石深翠紫，纹似金星细如肌。配在文房成四宝，磨而不磷性相宜”，给贺兰石砚以高度评价。

贺兰石砚在艺术风格上主要讲究“相石”“俏彩”。“相石”就是看石料的质地是否细润，彩石的走向和纹理，以及石料的大小、厚薄和自然形状等。先做到心中有序，然后再根据石料的不同色彩和形状，决定砚台的尺寸和形状。一般形状有方、圆、椭圆、长方，也有荷叶、葫芦、金瓜、钟、琴和其他一些自然形状。“俏彩”就是根据绿紫两色石料的不同特点不同层次，可以制出几层彩色不同的东西，使整个画面

了和中国广大民众共同抗日的决心。1937年2月，在撤离豫旺地区的三个月后，马海德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籍，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1988年10月去世，骨灰永远的留在八宝山。马海德1936年在豫旺地区改名并参加中国革命后，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卫生健康事业上，特别在消除麻疯病等地方传染病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2019年被授予共和国“最美奋斗者”光荣称号。

红军西征在同心地区点燃的抗战烈火，并没有因为红军的东撤而熄灭，而是愈燃愈烈。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逼蒋抗日，停止内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进入全民抗日战争时期。受红军西征的影响，同心籍的大学者、大阿訇馮嵩山，以自己的影响力，在宁夏区内外组织成立“回民抗日救国协会”，组织后方全力支援前线抗日。

抗战期间，宁夏著名三烈士之一的孟长有烈士，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受党组织委派，秘密潜入同心海如完小以教书为掩护，开展抗日宣传，组织抗日力量，不幸被敌特告密，国民党宁夏当局下令抓捕拘押，海如完小的师生涌进县政府，要求释放非法拘押的孟长有老师。马鸿逵恐有事变，下令押送银川秘密处决。孟长有烈士和皖南新四军一样，没死在抗日前线，却牺牲在民国政府党派之争的“闹摩擦”中。

开展红色教育的具体做法：一要充分发挥红军西征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最大可能的做好接待服务工作。只要有要求参观学习者，节假日、周日我们都正常接待。红军西征纪念馆还是中共宁夏党校、区委组织部、六盘山干部学院确定干部培训教育现场教学基地，我们也充分利用这些平台的宣传作用。近年来各类游客年接待量平均达到15万，累计受教育人数超过25万人次。二要走出同心，走进社会大讲堂，走进大中小学。红色教育从娃娃抓起，更广泛的开展对外宣传。在这方面，县政府返聘红军西征纪念馆的党史研究员杨文教授做的尤为突出，近年来他应邀在全国各地和各大院校、部队营地讲座100多场，受众人数近10万人。三要积极参与各级各类红色旅游讲解大赛。近年来红军西征纪念馆先后参加各种比赛十余场，并多次获省部级、区、市级奖。四要积极配合各级各类媒体的专题拍摄和采访，扩大对外宣传。

建议：保护和开发豫旺“抗战之声”拍摄地，在原址塑小号手雕塑并撰写说明；在县城红军西征纪念馆周围建“马海德和斯诺纪念馆”。

（作者系红军西征纪念馆馆员）

绿紫分明，互相衬托，突出主题。如在紫色上可利用上面的绿色作出人物，又用绿色上的紫色作出人物的头发、眉眼以及衣着首饰等，这样就一层衬托一层，美观大方。“俏彩”一定要俏得恰到好处，多一点不要，少一点不行。根据这个要求，可制作出色彩清雅的山水，华美的花鸟，形象逼真的动物等图案。贺兰石除制作砚台外，还可用来雕刻各种印章、制作笔架，笔筒、印泥盒、墨水盒等文房用具和鼻烟壶、挂屏、立体圆雕等。北京人民大会堂宁夏厅悬挂的《清平乐·六盘山》词的大挂屏和《红军长征过六盘山》的大插屏，就是用贺兰石雕成的。另外，还可以制作大型碑记，如银川市的海宝塔碑记等。

解放前，贺兰石砚的主要顾客是书法家、画家、文人、买卖人和外地商人，也有官家买来送礼的。解放后，贺兰石砚除在国内销售外，还远销到日本和东南亚各国。

据我所知，在清末时，宁夏制砚只有三四家，工具也很落后。民国年间，制砚艺人渐多，工具也有所改进。当时，我父亲和叔叔阎万庆、阎万年都是有点名声的制砚手艺人。但到解放前夕，有些老艺人相继去世，有的改行，这门手艺几乎没人干了。解放后，合作化时只有连我在内的三个制砚手艺人，到1963年成立贺兰石刻厂时，发展到十四五人。1965年，日本一家向我们提出每年订购一万块贺兰石砚的合同，但我们实际只能每年生产四百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厂关门，合同中断，给国家造成了一定损失。现在有些老艺人退休了，年轻艺徒又改行，剩下的新人只有八九个人了。所以，如何使贺兰石的雕刻艺术发扬光大，后继有人，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摘自《宁夏文史资料》第十七辑）